

皮特·肖伍德(澳) 著
王乃平 译

老
外
看
中
医
系
列



HEALING



现在世界上80%的人口都接受过自然医学的治疗。

自然医学是一种健康看护的哲学，它包含了这样一种生活观点，
就是要能看到健康和疾病的未来，

要提供一种充实有趣并感到幸福的生活模式。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皮特·肖伍德(澳) 著
王乃平 译



肾源

HEALING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医源/ (澳) 肖伍德著; 王乃平译.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 - 7 - 80231 - 822 - 9

I. ①医… II. ①肖…②王… III. ①医学史 - 世界 IV. ①R - 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4745 号

© Peter Sherwood 2005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国 2009

出版声明: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本的全球发行权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独家享有。

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0 - 0704 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6.25 字数 474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31 - 822 - 9

*

定价 45.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 64065415 010 84042153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请先阅读这一部分...

这本你可能很少见到的书解释了为什么自然医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那么广泛的应用。用比较容易理解的话来说，这本书也说明了自然医学的应用在 20 世纪，特别是西方，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而且现在世界上 80% 的人口都接受过自然医学的治疗。

在美国，就诊于自然医学的人比看西医的人要多。在澳大利亚，就诊于自然医学的人在不断增加，而就诊于（政府所办的）医院的人数则在不断减少。从现在的潮流来看，到 2015 年，就诊于自然医学的人数将大大超过就诊于西医的人数。

本书将描述一些古老的、很少人知道的哲学概念，如整体论^①、生机论^②、头脑与机体的联系、精神、解毒、消化、免疫等等。我们还将说明这些概念在现代自然医学实践和公共卫生中的重要性。

自然医学与西医学（现代医学、生物医学）之间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重在康复（healing），而后者重在阻断或消除症状。值得重视的是流行病学调查所暴露出来的治疗过程中的（意外）死亡或伤害如此之多，使得生物医学在实践

① 整体论（holism）：是指一个系统并不能被其组成成分之和所解释或决定。

② 生机论（vitalism）：一种理论或学说，认为生命的过程来自于或包含有一种非物质的生命原则，不能完全解释为物理和化学现象。

中变得非常危险。

这些现象提示我们，自然医学工作者与（西医）医生应该为了患者通力合作，将两种医学模式结合起来。但是这种合作却有很多障碍：两种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以及过去 2000 多年来各种势力对自然医学的打压。在欧洲中世纪超过 300 年的历史中，宗教裁判所将许多自然医学康复师污蔑为巫师而杀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教会、政府、大学和西医医生们一直对这种便利的医疗方式进行打压，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打压的手段更为复杂。

本书首先追溯史前直到中世纪医学的发展，在这一时间段内，自然医学实践被从教会和政府的大学培训出来的中世纪医学中分离了出来。然后，我们还将叙述中世纪医学如何变成了生物医学，并与自然医学进一步分离，最终发展成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从而使许多新的疾病被认识并得到治疗，在临床科学、外科、医技、药物和其他相关产品的开发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公众大多知道生物医学中所存在的危险和自然医学在康复中的作用。他们一直在支持自然医学，有时还会反对政府的某些做法，后者常对生物医学做一些误导的甚至是不诚实的宣传。



译者前言

皮特·肖伍德先生是我所在的广西中医学院的老朋友，对中国也非常熟悉，除了不会中文，也算是个中国通了。早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就和几个同伴来到中国，还曾被红卫兵当成特务抓起来关押了 1 个星期。尽管这样，他依然无怨无悔，从那时起，他到中国的次数已经多得无法统计（关于他在中国的经历，我曾建议他写出来，我想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他和他所一手创建的澳大利亚自然医学院（Austrian College of Natural Medicine）就开始与广西中医学院合作，20 多年来，许多广西中医学院的领导和老师都应邀访问过他的自然医学院，他本人更是几乎每年都要到广西来。尽管现在他不再继续主持澳大利亚自然医学院的工作，但他所开创的两校间的合作仍在继续，两校的关系依然紧密。

本书是集皮特先生从事自然医学几十年的感想与经验，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它涉及自然医学，包括中医学、印度医学、古希腊和古罗马医学、欧美以及澳大利亚民间医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皮特先生对自然医学有着一份深深的爱和执著的追求。他痛恨一切对自然医学的打压行为，为自然医学能够自立于世界医学之林而大声呼吁。

本书有些观点可能过于偏激，例如对现代医学的否定就显得有点以偏概全。当然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其中的是非曲折请读者自行判断。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译者对一些可能需要了解背景的问题加了一些注释，脚注中除了注明者外均为译注。

本书的翻译除得到原作者皮特先生的帮助外，澳大利亚自然医学院的江漫医生也给予了大力协助。广西中医学院国际交流处蒋基昌处长对部分内容的翻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王乃平

2009年12月

于南宁



致我的中国读者

中医理论、实践和哲学为世界所熟知并接受，因为中国人将这些著作翻译成了多种语言。

自从我 1967 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我就经常阅读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学术著作和其他作品。我非常感谢所有参与到翻译工作中的人，因为这使我不但成为了中医大夫，也了解了中国的哲学思想。

虽然我第一次访问南宁是在 1968 年，但直到 1988 年我再次访问南宁时才遇到了从事这些翻译工作的高级学者。从那时起我们的友谊使数百名澳大利亚学生在后来的岁月里得以在南宁接受临床训练，也鼓励了更多的翻译工作。

当我尊敬的广西中医学院王乃平院长提出愿意将我的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时，我高兴极了。从我们第一次相遇开始，我就非常尊敬王院长，就像我也非常尊敬他的前任一样。对我来说，一个如此繁忙的人能够完成这本书的翻译简直就是奇迹。不过，中国到处都是奇迹。

这个译本对于那些对自然医学的历史、哲学和实践的西方观念及其在西方社会的应用感兴趣的人来说，应该是很有用的。研究人员、教师和学生会发现参考文献特别有用。

我们在西方受到各种历史和哲学的影响，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的经验不同。由于存在这些差异，各个国家的人总是很难互相理解。我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增进中国人民和西方人民之间的了解。通过这种了解，能产生真正的友谊与和谐。

皮特·肖伍德

2009 年 9 月

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致 谢

这本书如果没有同道的支持不可能完成。我要感谢澳大利亚自然医学院的员工，他们一直在鼓励我、支持我，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他们是戴维·斯蒂尔福克斯 (David Stelfox)、希娜·沃勒 (Sheena Worrall)、柯丝蒂·里基茨 (Kirsty Ricketts)、林恩·巴特利特 (Lynn Bartlett)，以及前顾问贾森·科普兰 (Jason Copeland) 和贾弗里·塞思 (Jaffrey Seth)。

我同样感谢其他一些朋友，包括默文·利特曼 (Mervyn Littmann)、安德鲁·纳斯克 (Andrew Nuske)、格里夫·鲍威尔 (Clive Powell)、盖尔·拉瑟福德 (Gail Rutherford)，以及阿瑟·奥尼尔 (Arthur O'Neill)，他们对本书的内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盖尔·拉瑟福德还提供了本书的艺术设计。我在维多利亚大学的博士论文的导师们，巴里·内斯特 (Barry Nester)、凯里·沃森 (Kerry Watson) 和罗布·赫斯 (Rob Hess) 给我提供了灵感、勇气、想法和精神支持。

我还要向广西中医学院的同仁们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所有列在参考文献中的人们，他们提供了让我们去跟随的源泉。在过去的5年中，对他们的一些工作我是如此感动，以至于常常想亲自去见见他们，向他们出色的工作表达我个人的感激之情。

皮特·肖伍德
2005年1月
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格里夫·鲍威尔的前言

自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学习自然疗法、中医学和顺势疗法后，我就在寻找这样一本书。作为一个学生，这样一本讨论历史和哲学的著作，将有助于增强我进入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的信心。作为一个从业者，这样一本书将会节省我几千个小时的研究时间，可以让我的病人自己找到他们所要问的许多问题的答案。

这是一本划时代的并且是很及时的书。千百个历史的、哲学的画卷展现出了自然医学的原形，同时也展现了全球自然医学发展的轨迹。对动物和人类医学的描述提示我们，自然医学康复师永远都是富有同情心、能与患者分担痛苦并与患者合作、能将感情投入的人，治疗应该是个体化的，总之一切都应该是自然的。自然医学与生物医学的差异性就在于其包括了康复。现代社会里的自然医学的基本作用通过各种途径显示了出来。这包括以一种令人信服的、适当的、严肃的方式告知患者现代科学和生物医学存在的不足和危险性。

这本由皮特·肖伍德——一个有 40 年康复治疗经验的从业者——所写的书中所描述的事实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在过去的 30 年里，澳大利亚自然医学界发生的每次重大事件都有他的身影。像他的其他朋友一样，我对他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不感到有什么惊奇了。我最高兴的就是自从 1982 年作为一个新生在他的学院遇到他以后，我们成了朋友。

皮特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在运动按摩方面从事自然医学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就像许多他的同道那样，既没有学校可以进去学习，也没有什么用得着的教科书。所用的药物仅限于食物、维生素、矿物质和生理盐水。花草只是种来供人们观赏，尽管也被一些草药学家拿来治病。

他对自然医学的兴趣逐渐浓厚，特别是 1967 年以后，那时他去了趟中国，参观了一些大学医院的中医科、中医诊所和公社卫生院。从 1969 年到 1971 年，他在南美和欧洲旅行，观察了西方的自然医学。回到澳大利亚后，他正式开始学习中医和其他自然医学，并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1983 年，他在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完成了他的本科学业。然后他又在昆士兰科技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在维多利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

数十年来，他一直在从事自然医学的工作，包括诊疗、政策制定、教育、管理、对外交往、研究等等。他还考察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斐济、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的自然医学发展状况，并经常访问中国、南美和欧洲。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他成功地领导了昆士兰地方反对工党联邦政府试图通过治疗用品管理局（Therapeutic Goods Administration, TGA）来限制自然医学发展的政治运动（TGA 辩论案）。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构筑了一个包括各种观点和各种相关团体的架构。他从来没想过要出风头，但一个与他合作的热心团体把他推到了前方。这个过程使他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不停地说服那些堪培拉的高级公务员、澳大利亚和昆士兰的议员（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他）以及内阁成员。

这场运动包括了席卷整个布里斯班的持续抗议浪潮；媒体的连续报道；学生、自然医学从业人员、其他从事自然医学工作的人以及公众与议员们的反复直接对话；持续多年的布里斯班公众大联盟。在赢得了这场战斗之后，皮特被邀请到堪培拉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他甚至说服了内阁为一些研究提供基金。

TGA 辩论案结束后，政府聘请皮特出任新成立的专门为自然医学的安全与疗效提供咨询的传统医学发展委员会的主席——在这个位置上他干了 7 年。皮特的影响力使得委员会成了帮助自然医学工作者们争取利益的代表。后来，联邦政府

邀请他作为主席主持了在堪培拉旧国会大厦有 50 名自然医学产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他还担任过最初的两届澳大利亚全国自然医学工作者大会的主席。皮特作为志愿者还是许多委员会的成员，他还是澳大利亚传统医学协会和澳大利亚针灸学会的主席。

通过和皮特一块儿旅行，我看到了他的国际性。在中国，他是一个很知名的演讲者，是大学和普通人家的常客。在马来西亚，他提出了不少职业上的建议，他对他的穆斯林客人的治疗让我印象深刻：他仅凭着双手就有效地解除了病人的痛苦。皮特还在印度帮助发展针灸。在那里，他在总统府被正式介绍给印度总统，并获得了一枚印度职业金牌。印度电视台曾经采访过他，他还参加了电台的一个系列访谈节目，有 1 亿多人收听了他的讲话。皮特使许多社会团体着迷，他在孟买的朋友从基督教徒到索罗亚斯德教徒^①都有。作为对他在自然医学领域做出的贡献的认可，亚州（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他在 1980 年创建的澳大利亚自然医学院有 5 个校区，超过 4000 名学生，在世界上都算得上是最大的。在上世纪 90 年代通过与中国南方的广西中医学院的亲密合作，他被聘为该校的副教授，5 年后被聘为教授。

在过去的 30 年里，他准确地预见到了支持自然医学的团体的增加和社会需要的改变。上世纪 80 年代他对保健食品产业、制药、健康疗养院、美容中心等领域的自然疗法工作机会将大量增加的预言让许多人感到吃惊。他还预言了在工作场所、机场、海滩、体育馆及其他一些地方对按摩服务的需求会大量增加，公众对专门的自然医学中心的支持也会增大。

皮特是一个不计报酬的康复工作者，他的服务从不收费。他把康复工作，就像他所做的其他许多工作一样，看成是生命旅程中的一部分。他的那些为扩大自然医学在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影响的工作更像是精神上的旅程，而不是为了赚钱。他坚信给别人的越多，别人给自己的也越多——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

^① 索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亦称祆教，也就是拜火教。公元前 6 世纪前期，在中东地区有一个信仰唯一真神的宗教。这种宗教推崇一位先知，先知的名字叫索罗亚斯德。后来，人们将这种宗教称为“索罗亚斯德教”。

金钱。他的慷慨大方颇具传奇色彩。同时，他还赞助了不少政治活动和许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皮特在自然医学上的巨大成功与他作为志愿者曾长期投身政治、做过海岸救生员、从事过工商业活动等有关。1977年，一个妇女组织因他作为昆士兰铁路妇女的代表而做出的创造性工作而授与他“昆士兰年度贸易联合会积极分子”的称号。他在昆士兰铁路贸易联合会担任州秘书长和后来在大学进行学术活动的经历激发了他对健康问题的兴趣。他发现自然医学提供了应对各种健康问题的最好机会。他是最先预言澳大利亚贸易联合会发展趋势的人之一，并对忽视工人健康，否认自然医学作用的现象提出了批评。皮特的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他曾遇到过海难，而且还是两次。

这本书来源于皮特的博士论文，当然也包括了他40年的自然医学实践。它包含了大量的研究材料，文笔流畅，并且通俗易懂。自然医学的专业背景支撑着他强烈而又鲜明的视野。自然医学事业已经长久地在等待着谁来记述他们。皮特担当了这一重任，因为他要正直地表达他的信仰。这本书就是他的一个缩影。

格里夫·鲍威尔 (Clive Powell)

折衷派的自然医学工作者

2005年1月10日

于斯坦索普



绪言

我的心路历程

我对自然医学的看法形成了一种偏爱。由于读者很想知道我这种偏爱是如何形成的，我不得不对相关的事情作一个简短的介绍。

我对接受自然医学疗法的最早记忆是 20 世纪 40 年代。我的工人阶级的母亲用她的安抚、拥抱、亲吻、抚摸、敲打、吹气、按摩、鼓励和爱让我的疼痛和恐惧消失。她并不需要知道她这些举动的理论，作为一个慈爱的母亲，她本能地做了这些——就像其他的母亲能做的那样。

50 年代，我在大学踢足球，第一次看到了更正规的按摩。在接受按摩之后，我惊奇地发现疼痛消失了，我又能参加艰苦的足球赛了。到了 60 年代，我开始帮着做一些赛前和赛后的按摩工作，得到队员们的赞许后我是那么的高兴。虽然我主要是通过观察和自己接受按摩来学习，但也得到了那个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去为所有队员按摩的按摩师的指导。看到按摩对于缓解疼痛那么有效让人真的很高兴，即便离开足球俱乐部以后也是如此。我读了所有能找得到的按摩书，着手准备自己的按摩事业。

中国

我对自然医学的兴趣逐渐增加，特别是 1967 年到 1968 年，那时我访问了中国，在那里的大学医院、诊所和一个人民公社我亲眼看到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

我在上海市郊某人民公社的一个用土砖垒起来的、泥土地板的农家里住了一小段时间，看到了中医的作用和它的哲学理论对这个家庭以及这个公社的其他家庭的影响。

他们的作息很有规律，突然的气候变化会带来饮食的改变。看到用不同的饮食来抵御自然变化的影响真是很有意思。食物的另一个功能是参与康复过程。按照中国人的观点，饮食有这样一些作用：

- 提供营养；
- 通过美味得到快乐，并有利于社交；
- 增强免疫系统，抵抗疾病；
- 加快疾病的康复过程。

一想到生活在中国的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不依赖于生物医学的内外科治疗就让人目眩。

中国式的康复过程主要包括针灸、推拿、草药、按摩，以及武术、打坐和食疗的应用。人们被告知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因此每天要做操，食物要与气候和季节相适应。为了保持健康需要一个达到平衡的生活习惯。对自然的适应让人印象深刻。

我决定学中医，因为我觉得它在西方也会是有效的，而且一定会普及。不幸的是我还是无法开始，因为中国正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8年的时候竹帘子已经将许多外国人挡在外面很多年了。

美国和加拿大

从1969年到1971年，我旅行到了北美和欧洲，去寻找西方的自然医学，学到了不少东西。那是一个性、毒品和摇滚乐的时代，伴随着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反对越南战争，魁北克、爱尔兰和巴勒斯坦的暴力分离主义，其他一些暴力革命，肯特州暴力冲突，争取市民权利，环境保护主义，违禁药物，留长发，花花

派对^①，抵制资本主义，群居，回归自然等等。那时1澳元可以兑换1.15美元，正是去旅游的好时机。

在洛杉矶和旧金山，我走访了一些标有自然医学治疗和教育的中心，在那里，我接受治疗，出席演讲会，观看了他们的工作场所，还会见了一些名医和自我标榜的“领袖”。其中一些显得非常自信。他们一方面从事着康复工作，但有时又像是娱乐行业，这从他们的穿着和讲话中可以显示出来——不过也不奇怪，好莱坞就在旁边。“领袖”的追随者们对寄托了自己健康的“领袖”的任何治疗方法都完全信任。一位病人坚持认为给她治疗的“领袖”到缺乏领袖人物的纽约去发展后，她的症状又出现了。

我找到了一些资料，有关这些“领袖”的书籍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形式：

- 为了吸引读者，常以对一段不可思议的事迹的描述开始（前三个字母可能还加了着重号），用以提示“领袖”就是比读者高明；
- 书中几乎都有来自名人的关于“领袖”能够妙手回春、拯救世人的证明（但我从来没能亲眼见到）；
- 同时，“领袖”会告诉你他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让病人康复如初；
- 书中充满哲学理论，但通常一篇参考文献也没有；
- “领袖”常会告诉你他们具有神秘的知识和能量，因而离上帝很近；
- 这些书都非常普及（甚至我也有）。

尽管这些“领袖”不乏狂热的追随者，收入也很高，但他们的康复模式却不是我所想象的。我仍然向往中国的模式：平凡的医生和自信的病人。病人应该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康复工作者的责任就是教导病人如何做到这点。而那些“领袖们”却意图使人相信，能否康复只取决于对“领袖”的信服和尊敬程度，而不是一个互动过程。

^① 花花派对：flower power，出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当时的嬉皮士中心旧金山的 Haight - Ashbury 街道一带，常聚集大批反传统的青年男女。女孩都头戴花朵。当时有一首歌唱到：“If you going to San Francisco, be sure to wear some flowers on your head”。花是和平、爱情的象征。这些戴花的青年，自称“flower children”，宣扬“flower power”。在反越战运动中，示威学生把花挂到士兵的枪杆上，象征“flower power”胜过枪杆子的“power”。

英国

在自然医学方面，英国是一个保守的地方。很有本事的康复工作者在这个国家到处都是，但却没有什么影响力。他们为他们的工作和传统而骄傲，看起来似乎也很忙。由于报酬比较低，他们并不指望通过这份工作来积累财富。他们中的许多人走出家门工作，那些男草医跟我打招呼时都穿着舒适的、有点破旧的套头羊毛衫。我所见到的康复师们都鼓励他们的病人采取一种温和的生活方式，并要求他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周围的大夫们都很亲切，他们那种自然的真实感让你能感到他们的魅力和热情，而且还会受到鼓舞。

我在中国、加利福尼亚和英国的经历证明，虽然老百姓有接受自然疗法的愿望，但这种愿望的实现却受到自然医学工作者是否有能力、有水平的限制。很明显，西方自然医学服务的发展只能取决于产生高质量毕业生的高质量大学教育。最理想的就是这些毕业生能展示出中国、北美、英国的最好的方面。当然，首先是我自己需要接受一些正规的自然医学教育。

反主流文化运动

反主流文化的代表是流行音乐中的披头士摇滚乐，我记得1970年1月在多伦多时曾看过这种演出。由于自然医学也是反主流文化和回归自然运动的一部分，很快就普及开来，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对自然医学的支持在那个年代波及了整个世界，并且还在继续，所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还是必要的。

波及世界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伴随着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衰退。这种衰退看起来是一种相对阳性的表现，如不受欢迎的战争、暴力、歧视、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医源性疾病、人性的虚伪、一些掌权者的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等等。人们都希望情况能变得好一点。随着人们对改革道路的探讨，这种希望变成了一种信念，那就是这个社会必须要发生变化。终于，既是歌手又是诗人的鲍